

戰國時代「壹」的觀念

李 訓 詳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博士班學生

一、前 言

在不同的時代，基於不同的歷史背景，往往各有其獨特的主導性觀念。這種觀念由於符契當時人共同的認知，適合當時人共同的需要，所以能得到共鳴，在不同的領域均可觸機而發，加以應用與推衍，成爲一種時代的思潮，或是時代共同的思想特徵。漢代的天人感應之說，就是一個例子，當時不論是儒者的解經，還是術數的發展，都是順著這樣一個主導性觀念的理路來進行的。

研究歷史上不同時代的主導性觀念，不僅可以讓我們回溯當時人的集體心態，而且由於時空環境的隔離，比較不容易將某些觀念視爲天經地義，因而可以比較客觀的判斷這些主導性觀念在歷史上所發生的作用。不像一般歷史事件的紀錄或見證，這類判斷我們往往無法直接採自歷史人物的言論，而是要站在我們的時空環境，才可能看得清楚。

「壹」或者是「一」，⁽¹⁾就是戰國時代中期以後所流行的一

(1)「壹」或「一」在文獻上均有使用，雖然用字不同，但兩者意義並無差別。至多只是在詞性不同時加以分別，文獻中常見兩字並用，如《管子·權修》：「民衆而可一，

個主導性觀念。「壹」的強調，屢見於戰國的文獻，具有這樣觀念的學派，不在少數，其意義也並不單純，對於瞭解戰國時人的心態與思維方式來說，應該是一個具有關鍵性的觀念。本文即就文獻所見「壹」的觀念略加陳述，說明「壹」在戰國時代的內涵變化與其歷史意義。

二、兵事與「壹」

「壹」在兵事上原來是一個具有相當實效性的觀念。時代愈晚近，戰勝有賴於群體協同合作的因素愈重要。遠者不可知，至少在商周時代，軍事行動已走上編制化，兩軍對峙，各佈陣勢，個人的勇力雖然重要，兵員間的協同一致更是致勝的關鍵。《周禮·春官·大司馬》中所見的教戰之法，訓練的重點並不是個人的戰技，而是群體的協同。在《司馬法》中，我們所看到的步兵方陣配備弓矢、戈、矛、戟、殳五種兵器，「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定爵〉）這種複雜的配合是需要高度的一致性的。所以在兵書中往往提到「一」的重要，《司馬法·嚴位》中說：「凡勝，三軍一人勝。」

《孫子·軍爭》中也說：「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兵事中對「一」的強調顯然有實證上的經驗背景。然而軍事行動要求齊一，本為古今一貫的通例，原無足為異，值得注意的是兵家言中對「一」的認識與強調，其層次遠為複雜，並不限於行動一致的層面而已。「一」的概念是在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與文化環境中形成的。

春秋戰國之際是個大變動的世局，在軍事上也是兵員大量擴

充的時代，戰爭型態的改變，使得許多原本在封建舊規中不納入徵兵範圍的人民也被徵調服役。⁽²⁾處於這個轉變時期的孔子目睹民衆大量被用於戰陣的紊亂情況，曾深有感慨：「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論語·子路》）這種轉變期的狀況大概有點類似法國大革命之後實施普遍徵兵制，大量徵召國民兵的情形，新徵的兵員不論在心態上、戰技上，均不同於以往的職業軍人，因此在動員的基點與戰術上，均須作一調整。由於法國國民兵是靠熱情而徵召來的，於是馬賽曲成了最有力的宣傳；而由於國民兵紀律較差，不能作當時流行的機械化隊形變換，所以散兵的疏散隊形也取代了以往的密集隊形。⁽³⁾春秋戰國之際的情形比起法國的徵兵制自然有很大的差別，但是面對轉變的困難，則是一樣的。由先秦兵書所反映的情形來看，如何搏合運用衆多的兵員成了軍事上最重要的問題，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一」的要求，成了解決用兵問題的奧秘。

《孫子兵法》中帶兵的關鍵，可以說是環繞著「一」的觀念而生的。「一」原有不同的層次，在大戰略的角度來說，是舉國意志的搏合，所以兵法開宗明義即云：「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另一個層次則是戰陣上的協同問題，此即《孫子》在〈九地〉篇中說：「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又說：「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在一個擴大徵

(2) 參見杜正勝，《編戶齊民》第二章，〈全國皆兵的新軍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九年。

(3) 參見Fuller, *The Conduct of War*, 中譯本《戰爭指導》，鈕先鐘譯，第二章，第三節，〈征兵制所引起的變化〉。台北，軍事譯粹社，民國七十年再版。

兵的時代，這兩個問題是同時出現的。所以不論是對舉國的人心動員，還是對新徵兵員的訓練，都可以用「一」的觀念來加以籠罩。荀子說：「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荀子·議兵》）這是屬於人心動員層次的，孫子所說的「令民與上同意」，即是荀子的「壹民」。從春秋晚期一直到戰國，這一直是各國軍政上的重要問題。(4)

就用兵的層次來說，在兵法中，能戰勝的軍隊，必須符合「一」的狀態，《尉繚子·武議》中描述這種軍隊，稱作「一人之兵」：

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電，震雷冥冥，天下皆驚。

《管子·兵法》對兵事上的「壹」所具有的威力，更是極力鋪陳：

故至善不戰，其次一之。破大勝彊，一之至也。亂之不以變，乘之不以詭，勝之不以詐，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

在《管子·兵法》中所看到的對「一」的陳述，已經把「一」提高到原理性的層次。《管子》中自然提到治軍必須具備諸多條件，比如軍財、良工、政教、器械、服習等等，但是總括一切，戰勝的最大關鍵，還是在於能否契合「一」的原理。「一」的地位，遂提昇到等於兵道的地位。《六韜·文韜·兵道》云：

(4) 關於人心動員的詳細情況，參見李訓詳，《先秦的兵家》頁七八至八五。台灣大學文學院，民國八十年。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如何？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機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

如果把這段話與《司馬法》所說的作一比較，可以明顯看出「一」的觀念在軍事領域重要性的提昇。《司馬法·定爵》云：

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

在《司馬法》中，「一」不過是用兵治亂之道的一端而已，但是在《六韜》中，「一」已經被提昇為兵道的最高原則，而且「一」的內容，似乎也不再限於以金鼓號令齊一行爲或統合衆心的簡單層次，而是一種統合種種變數之後，具有神秘意味的最高原理的掌握。《鷦冠子》中屢見此類想法：

昔善戰者，舉兵相從，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之極，與神同方，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明者爲法，微道是行。

（〈世兵〉）

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一宰萬而不總，類類生之。

。（〈天權〉）

根據此「用一不窮」之道用兵，將可：

齊過進退，參之天地。出實觸虛，禽將破軍。發如鍼矢，動如雷霆，暴疾擣虛，殷若壞牆。執急節短，用不綣綣。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趨吾所時，援吾所勝。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窮。得此道者，驅用市人，乘流以逝，與道翱翔。

所以兵道的「一」，可說是結合了天時、地利、人和的統合性致勝原理，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與早期《孫子》所言「犯三軍之衆

，若使一人」的簡單「一」的觀念相比較，已經不是一種具體而容易把握的觀念了。

兵道的高度抽象化並不止於此，到漢代《淮南子·兵略》所說的兵道，已與整個道體沒有分殊了，其語云：

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

兵道即等同於大道，是最高的統合，別無分殊。也由於道是不可言說的，所以只能用「一」這樣形式的觀念來表達。在兵事的領域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由實效性的觀念，上昇到一種抽象的致勝原理，乃至於等同於道的變化。

三、治術與「壹」

如同兵事上「一」的強調原出於其實效上的認識，戰國時代在政治與社會行為上對「一」的肯定，也是來自「一」所代表的秩序、和諧與效率。事實上，這種肯定一部份的來源，可能還是來自軍事經驗。《呂氏春秋·不二》中舉以說明「一治異亂」的道理時說：

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

文中所舉的例子，顯然是來自軍事行動的經驗。

《墨子》的尚同思想，也是來自對秩序的渴望，〈尚同中〉云：

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

這種對「一同天下之義」的渴望，多少是現實中所目睹的亂象的反應。所謂「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兄弟之禮」，正是封建解體之後，最常見諸時人筆下的批判。像《商君書》中所強烈裁抑的「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靡事商賈技藝的蠹民，都是戰國以後的新興社會現象。這些現象都是前所未見的，新起的社會活力所表現出的嗜利或亂紀，不論對統治者或學者本人來說，都帶來相當程度的惶惑不安。儒道法墨各學派的理論與嚮往雖然不同，但是對於這種混亂情況所表現的不安，倒是相當一致的。在戰國中晚以下，在政治社會秩序的運作上，強調「壹民」、「一法」、「一治」，表現出一種對「一」的觀念中所蘊涵的絕對秩序的高度興趣與信賴，其中的原因是相當值得玩味的。

《管子》中常見壹民的想法，〈權修〉中說：

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

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

壹民者，所壹者何？《管子》所壹的是民心。〈五輔〉中說

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

而壹民心的措施是相當外塑性與權威性的，主要是依靠當政者本身達到「一」的狀態。所以〈君臣上〉說：

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聞。

所以一民心就是仰賴在上位者建立共所遵循的標準。所一的標準，則包括所有生活與思想的軌範，這樣就可達到所謂的「一體之治」：

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緯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姦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
(〈君臣上〉)

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七法·遷陳〉)

後世一統帝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措施，可以在此找到根源。

《商君書》中壹民的程度更加嚴格，把「一」作為一種思維形式納入實際政治措施的痕跡也更明顯。由〈壹言〉篇名的命意看來，「壹」可以看作商君學派施政上一個關鍵性的概念。

治國的要務，不外刑、賞、教數端的運用，在《商君書》中，這些均以「壹」的概念來加以貫串，〈賞刑〉中說：

聖人之爲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壹賞則兵無敵，壹刑則令行，壹教則下聽上。…所謂壹賞者，利祿官爵擄出於兵，無有異施也。…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

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所謂壹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以獨力私議以陳其上。所以在《商君書》中有「作壹」這樣一個語彙，說明了農戰、賞刑運用等施政手腕，均統一在「壹」的思維形式之下：

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於農而已。（〈農戰〉）

國作壹一歲，十歲彊。作壹十歲，百歲彊。作壹百歲，千歲彊。千歲彊者王。（〈去彊〉）

作一則力搏，力搏則彊。（〈農戰〉）

聖人治國也，審壹而已矣。（〈賞刑〉）

在當政者「作壹」的外範下，可以軌範封建秩序鬆動後產生的亂象，塑造樸壹之民：

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農（之）民，無所食，而必農。

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則農民必靜。（〈壅令〉）

善爲國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農戰〉）

這樣的社會秩序的要求，和墨子說的「一同天下之義」，《管子》中的「一體之治」，形式上其實是沒有分別的。在這樣的思考方式中，「一」再也不只是實效的觀念而已，它本身也同時具有高度的價值意義。各派學者儘有不同的思路，但是都肯定了一個具有共同形式特徵的政治社會型態，也就是「一」的社會。《荀子·成相》云：「治復一，脩之吉。」《呂氏春秋·執一》也說：「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王者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

則治，兩則亂。」中國穩固的大一統帝國型態，正是肇始於這樣的共同思想傾向上。

四、執一與聖人

前面兩節說明了「一」的觀念由實效上的意義逐漸地抽象化，並被賦予高度的價值意義。由於如此，「一」的掌握便成為橫掃冗雜表象，直指事理真相的關鍵。同時這樣內涵的「一」的觀念，也不能用常識性的思惟方式來理解與掌握了。掌握「一」的方式，必須在內在精神上有深度的契合。在文獻中，這樣的方式有「執一」、「守一」、「得一」等等的稱呼。

在與道家黃老有關聯的學者中，類似「執一」的觀念是屢見不鮮的。《老子》中這類觀念的敘述不少：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第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第三十四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第九章）所謂「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即爲《呂氏春秋·執一》所說的「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呂氏春秋·論人》對於「一」的掌握，更有詳細的闡論：

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其求之彌疆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若此者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則知

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物，得一而後成，故知一則應物詭化，闢大淵深，不可測也。

要得一，須掃除感官嗜欲的干擾，回到自身的自然純樸狀態，在此可以契合萬物造化的原理，也就是所謂的「一」，掌握這個原理，則可以應物之諸般變化而無窮。所以《呂氏春秋·論人》中認為：「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何物之不應。」《管子·內業》云：「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爲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則天下治矣。」說的也是由內在精神的凝斂以掌握事物最高原理的方法。在這一類學者的論述中，「一」其實就是道的同義詞，⁽⁵⁾《韓非子·揚權》即說：「道無雙，故曰一。」道之所以稱作一，應該就是來自「一」所代表的統合的、絕對的形式概念。

即使在不把「一」當作道的思想家中，「一」的狀態的掌握仍與最高真理的認識有密切的關係。《荀子·解蔽》云：

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

爲什麼心的壹是認識道的關鍵？因爲心和道在形式上有一個重要的聯繫，也就是同具「一」的形式。此即〈解蔽〉中所說的：「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也由於認識到這道的統合的「一」的形式，因此荀子認為可以執樞要以御萬物，此即〈王制〉所說的：「以類行雜，以一行萬。」所以儘管各家對道的認識不同，但是以「一」作爲道的形式卻是共通的。由此衍生而來的能夠認

(5) 參見吳光，《黃老之學通論》第五章，第三節，呂氏春秋的哲學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識道的最高人格——聖人，也因此有了相當一致的特質：能夠執一、用一。

《荀子·王制》中所說的聖人其實就是「一」的形式觀念的人格化：

上察於天，下錯於地，塞於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故曰一與一，是爲人者，謂之聖人。

所謂「一與一」，詞義略費解，楊倞注云，「動皆一也。」王先謙則云，與讀爲舉，「上言『以一行萬』，是上之一也。『喪祭朝聘師旅諸事，皆所以一民』，是下之一也。以上之一，舉下之一，故曰一舉一。〈富國篇〉云，『上一則下一矣。』義可互證。」兩注的意思是相通的，而王先謙所說的更爲周延。聖人執一行道以一民，正如〈王制〉所說的，「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聖人正是「一」的形式統合到最高境界的人格表徵。

這樣的聖人概念並不只是儒家的理念，而是由戰國中晚「一」的形式思維推衍而來的產物。《莊子·天下》認爲古代大道未分的階段，「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莊子所說的「內聖外王」的理想人格，論者往往認爲「無異聖賢格言」⁽⁶⁾，其實當時所說的聖人，大抵皆有這種統合性的特質，這是時代的思

(6) 馬端臨曰：「莊生時，六籍未經秦火，其書具在也。而諸子百家各以其說舛馳而淆亂之，是以有闡鬱之憂。周以荒唐謬悠之言著書，蓋亦百家之一也。而此段議論，無異聖賢格言。東坡謂莊子助孔子者，於此助之。」轉引自錢穆，《莊子纂箋》，頁二七〇。台北，三民書局，民國六十七年。

潮。如《呂氏春秋·大樂》所說的：

先聖釋兩法一，是一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爲聖人。

和荀子所說的一樣，這都是結合了聖與王，與天地參的理想人格。這樣的人格，在《呂氏春秋》、《鶡冠子》、黃老帛書中是屢見不鮮的。

戰國學者普遍把「一」的觀念投射到道與聖人上面，恐怕和前面所談兵事和治術領域的情況一樣，也有深刻的時代烙印。戰國時代人習一義，各騁其說，當時的學者對於這種情況充滿了厭煩與不安。荀子在〈解蔽〉中就說：「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當時的情形則正是「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這些一曲之道，別而觀之，均言之成理，各有其是，亦有其非，彼此的詰難，只是各自呈現所是所非而已，也不可能由此定於一衷。《莊子·齊物論》即表現了這種莫衷一是的情況。他們認爲人之有所知有所蔽，均與認識上是否掌握了正確的方法有關，所以《呂氏春秋·有度》說：

執一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惑(惑)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

只要去除蔽障，那麼將可以認識到在一個大本原的統合下，所有的是非矛盾，都只是表面上的，在這個根本性的原理下，一切的異說可以歸其原位，回復原本的完美秩序，各暢其用。在這樣的心態下，戰國思想家普遍認爲道所表現的，是「一」的形式，而聖人則是對「一」具有掌握與體現能力的人格。從《莊子·天下

》、《荀子·非十二子》，到漢初的司馬談〈論六家要旨〉，都表現了根據最高原理來衡論各家得失的基調。劉向、劉歆的《七略》，把諸子學編入古王官學流衍的系統之下，恐怕也是延續了戰國強調「一」的觀念的心態而來。

與道合一的聖王人格，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一個獨特而重要的觀念，秦漢以下兩千年的專制政體和這個觀念有密切的關係。對於其源頭，一般均在儒家的傳統中尋找，因為儒家對人性的完美的可能表達了肯定的看法。不過道家、法家、墨家思想中也有濃厚的聖人思想，他們可能對人性並不信任，但無礙於對聖王人格的肯定。事實上除了儒家的理解之外，聖的涵義並不一定包括德行，因為道的層次原高過德的層次，而聖人的共義是在這個層次上說的。

五、太一的形成

戰國時代「一」的觀念的形式化，並且成為具有高度的價值意義，最清楚的象徵，是「太一」一名的提出及其涵意。

「太一」的意涵可分為數端。《荀子·禮論》中說：「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這裡所指的「大一」，楊倞引《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認為太一即指太古之時。其實這裡的「一」只是就本原的意義說的，為了尊崇禮的本原，而加稱為「太一」。

《呂氏春秋·大樂》中用「太一」的稱呼來尊稱道：

夫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

這裡所說的太一，很清楚地就是太極。一者指的是萬化之源的道，加稱「太一」，同樣也是用來表示「一」的尊崇。

「一」的尊崇的極致，則是以「太一」作為天帝的代名。《鶡冠子·泰一》：

泰一者，執大同之制，調泰鳴之氣，正神明之位者也。…

九皇殊制而莫不效焉，故曰泰一。

以「泰一」作為天神之名，大概就發生在「一」被視為道的別名時。同時中宮紫微垣天極星最亮的一星，也成了太一神常駐之所。此亦即〈泰一〉篇所說的：「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

太一成為神名起於何時？不是很清楚。現存的《甘石星經》雖然已有太一與天一二星為天帝神的記載，不過今本的來源不是沒有問題，未必可信。《鶡冠子》大概是戰國晚期，接近周秦之際的作品，太一神觀念的形成，或許不會距此太遠。(7)一直到漢武帝時代，才以亳人謬忌之奏而祠太一。（《史記·封禪書》）

根據前文所說的，戰國時代「一」的觀念原本具有相當的實證性，後來逐漸抽象化與形式化，也由實效的意義延伸為具有高度的價值意義。一直到太一的尊名出現，乃至成為天帝之神的名稱，「一」的觀念所具有的象徵意義與神聖性，才發展完成。不同層次的「一」的觀念，有極為不同的內涵，而這些不同內涵的「一」，可能同時並存。但是它們彼此之間，並不是可以割裂來

(7) 呂思勉，《經子解題·鶡冠子》云：「今所傳十九篇，皆詞古義茂，決非漢以後人所能為也。」台北，商務印書館，人人文庫本。這個觀點在目前考古材料出土益多的今天，已經得到可信的印證。

看的，也絕非互不相干。至少在戰國人的意識中，是不斷在「一」的觀念中，找到新的資源，來發展他們的思想。

六、結 論

秦始皇統一天下，他在各地所留下的頌德刻石，看來滿篇炎災大言，其實所表達的就是戰國以來「一」的觀念的內涵。我們在這些文告中，處處可見類似於《呂氏春秋·執一》所說「王者執一，以正萬物」，《商君書·壹言》所說「聖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從事於農也」以及《管子·君臣上》：「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的色彩。

「一」的觀念，原本是在時代的實踐中所產生的，我們可以看出「一」的講求原有效率的要求，但是落實到帝國的理念上時，「一」所具有的形式上的與價值上的意義，恐怕遠多過實效的要求。它符合了當時人「上一則下一」的心靈上的要求。《管子·兵法》說：「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秦始皇的天下雖然用千軍萬馬打下來的，充其量不過是個霸者，但為了厭服時人的想法，仍然僭取了「明一察道」的皇帝的名稱與價值。畢竟這一普遍思潮的力量是十分龐大的，我們不難在「定於一」的流行觀念中，看出秦漢時代大一統帝國孕萌的前景。

「一」的觀念自然是可以檢討的。一度量衡等實效性的「一」我們自可理解其必要性，但如今我們並不接受一位「兼聽萬事，遠近畢清」的聖人皇帝，我們也不覺得統整各地風俗代表高貴的價值，對於當時人亟欲尋求最高原理的整體性思維，我們也未

必同意。但是對於戰國以來的「壹」的觀念，我們仍應思考其對整個民族心靈塑造上的影響。畢竟對中國史的全程來說，它從來就不曾只是歷史。

On the Idea of 'Oneness' in the Warring-states Period

Li Hsün-hsiang

The idea of 'oneness' was a wide-spread and pivotal idea during the late Warring-states period. It was a key idea in understanding the collective mind of that time.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icate how the scholars discovered and comprehended the idea of 'oneness' through their practice in that chaotic age, and how the development of 'oneness' paralleled with the contemporary changes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It is argued that through the tracking back of such a collective mind, we could understand more of the mechanics beneath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absolutist empire.